

評蓋爾納的《民族和民族主義》

◎ 潘志新

厄內斯特·蓋爾納 (Ernest Gellner)，是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也是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二十世紀晚期現代性研究的著名理論家。他在哲學和社會學研究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主要著作有《思想與變革》(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 1964)、《文化、認同與政治》(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1994)、《民族主義》(Nationalism, 1997)等。《民族和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3)是他研究民族主義的早期作品。

從全球角度看，二十世紀民族主義出現過三次浪潮，簡單來說，第一次浪潮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二次浪潮表現為世紀中期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進程；第三次浪潮在世紀之末與蘇東劇變同時出現，造成國際格局的又一次巨大變化。民族主義研究也回應出現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直延續到第二次大戰後初期。卡爾頓·海斯 (Carlton J.H. Hayes,)、漢斯·科恩 (Hans Kohn) 被稱作民族主義學術研究的「開山雙祖」('the twin founding-fathers')，愛德華·H·卡爾 (E. H. Carr) 和卡爾·多伊奇 (K. W. Deutsch) 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作者。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就是探討了西方民族主義的思想淵源、歷史背景、形成過程、傳播方式等，抹去了民族主義宣傳家加在這一問題上的神話色彩，並為後來的研究者積累了大量資料。第二次研究高潮隨著60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而突然出現，並一直持續到80年代。博伊德·謝佛 (B. C. Shafer)、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和民族主義》(Ernest Gellner)、艾利·凱多里 (Elie Kedourie)、休·塞頓-沃森 (Hugh Seton-Watson)、約翰·布魯伊利 (John Breuilly)、安東尼·D·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米洛斯拉夫·赫洛奇 (Miroslav Hroch)、埃里克·霍布斯鮑姆 (Eric Hobsbawm) 等研究民族主義問題的著名學者都是在這個時期湧現出來的。這一時期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很大進展，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普遍被納入視野，民族和民族運動的本質、它們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等等，都得到充分的論述，各種學術流派也紛紛建立起來。進入90年代後，由前蘇聯集團地區和第三世界各地噴湧而出的民族主義運動引起了又一次研究高潮，眾多老作者紛紛寫出新著，他們的舊作不斷再版，大量的新人新作每年都在湧現出來。在所有這些時期，除專門著作外，在通史和其他歷史著作中，也有大量篇幅論述這一問題¹。1999年科索沃戰爭爆發，美國入侵伊拉克，中東和平進程受阻，尤其是我駐南使館被炸，國內輿論對民族主義的討論成為熱點，民族主義對世界局勢有何影響，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問題。

一 《民族和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

厄內斯特·蓋爾納在《民族和民族主義》(蓋爾納著，韓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北

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一書中介紹了民族主義的定義，民族主義的產生的根源、條件和途徑，民族主義類型和民族主義的未來。

甚麼是民族主義，他說：「簡言之，民族主義是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在要求族裔（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個國家中，族裔的疆界不應該將掌權者與其他人分割開。」（頁2）「民族主義的定義，是為使文化和政體一致，努力讓文化擁有自己的政治屋頂。」（頁57—58）

民族主義的產生，與資本主義的到來有關。他把社會分成前農業社會階段（或稱為狩獵採集社會）、農業社會階段和工業社會階段，農業社會和農業社會以前的社會不存在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的存在需要文化和權力兩個要素，而在農業社會和農業社會以前的社會，「可以這樣說：文化和權力，這兩者按照民族主義理論是缺一不可的潛在的合作夥伴，在農業時代主要的條件下，哪一個都不會太喜歡對方。」（頁15）只有到了工業社會才存在民族主義，他說：「正因此，按照我們的模式，向工業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必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時期，這是一個狂暴的調整時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兩者都在被改變，以滿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義的要求。」（頁53）

工業社會之所以存在著民族主義，是因為它具備了民族主義產生的基礎和必要條件，由於分工的不同和不斷變化，「這種經濟角色體系和其中的位置發生的迅速不斷的變化，產生了某些直接的、深刻的重要後果」（頁33）。這種後果就是某種平均主義和普及教育，而「這裏描述的教育，即普及的、標準化的、一般性的教育，的確（蓋爾納自己強調的）在現代社會的有效運行中起著某種重要作用，而不僅僅是社會使用的措辭可自我標榜的一部分」（頁39）。因為它為工業社會中某種次生文化和高層次文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高層次文化的出現，就必然導致民族主義，他說：「新普及的高層次文化，現在急需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加強。……既然高層次文化的任務如此偉大而艱巨，它就不可能不要政治基礎。正如《布蘭迪什小姐沒有蘭花》中的一個人物所指出的那樣，每個姑娘都應該有丈夫，並且最好是她自己的丈夫。現在，每一種高層次文化都希望有一個國家，並且最好是它自己的國家。並不是所有的野蠻文化都可以成為高層次文化，那些沒有可能成為趨勢的文化會自動退出舞台，它們不會產生民族主義。那些自認為有可能成為趨勢的文化，或者不用擬人的方法來談論的，而那些人類載體認為其前景光明的文化，互相爭奪就為了可以得到的人口和國家空間。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或者種族的衝突。在現有的政治疆界與舊的或者有政治抱負的具體的高層次文化的疆界不一致的地方，另一種極具民族主義時代特徵的衝突便會發生。」（頁67—68）所以，「民族主義的根源在於某種勞動分工，這種勞動分工是複雜的，不斷積累和變化著的」（頁46）。

工業社會也具備了民族主義產生的現實的充分條件：首先因為它存在次生文化產生的土壤，「在這個社會裏，雖然次生社群已被部分消蝕，它們的道德權威受到極大削弱，但是人們仍然在各個方面存在差異。人可以根據高矮胖瘦、膚色黑白來分類，也可以用許多其他方法來分類」。這種分類方法便是抗熵的；其次，「溝通障礙」和「社會一致性抑制」是民族主義的具體產生兩條途徑。溝通障礙是：「在工業化早期，那些離開與更發達的中心地區沒有甚麼聯繫的文化和語言群體而進入新秩序的人們，所處的地位甚至連那些沒有經濟實力，但與政治經濟統治者們共有同樣文化的新無產階級都不如。儘管文化和語言的距離，區分自己與別人不同的能力，會給個人帶來巨大的不利，但是可以並且往往最終成為這個新興世界的受害者的整個集體，或者未來可能形成的集體的優勢，使他們能夠認識，並且用明白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憤恨和不滿。……（他以假想的盧裏塔尼人（Ruritanians）的民族的形成過程說

明)也許情況遲早總會好轉；但是，它以這種民族的形式，帶來了一種新的高層次文化以及捍衛這種文化的國家。」(頁82)社會一致性抑制是指社會形成的次生文化促使民族主義的形成，「當然，在工業化早期，如果低俗文化顯得有政治前途，尤其是如果這些低俗文化代表了大量居住相對緊湊的人群的話，它們也有可能被利用，並變成處於不利地位的人的標誌，用來辨別他們的身份，使他們團結起來」(頁98)。這種抗熵性「出現在工業社會裏，會導致分歧，有時甚至是很大的分歧」(頁87)。「在這種情況下，存在著無法僅僅憑藉良心的意願和合法地位，或者政治上的領土恢復主義和實際行動就能夠排除的社會學方面的障礙，這些障礙妨礙了文化同質性和社會熵，而這些不僅僅是發達的工業社會的規範，而且似乎是這種社會順利運行的一個條件。這種對熵的有組織的抑制，很有可能是那個工業社會必須面對的最嚴重的威脅。」(頁92—93)所以，蓋爾納說：「是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人們公認，民族主義利用了事先業已存在的、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多種文化或者文化遺產，儘管這種利用是秘密的，並且往往把這些文化大加改頭換面。」(頁74)這樣民族主義就產生出來了。

蓋爾納按照「權力、教育和共同的文化」三個標準對民族主義進行分類，他說：「我們的模式的出現，得益於引入了三個真正有意義的因素：在我們希望意義上的權力、教育和共同的文化。」(頁128)按第一個要素權力來分，可以得到一個簡化了的現代社會模式：掌權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頁117—118)；把第二個要素教育加進來組合後，就可以得到四種可能的存在模式：「從權力分為兩部分的社會角度看，現在存在著四種明顯的可能性：可能只有掌權者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們用自己的權力特權來保持自己對受教育機會的壟斷；或者是掌權者和其他人都享有這種機會；亦或只有其他人(或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享有這種機會，而掌權者卻沒有；有時候，雙方都沒有這種機會，或者更簡單明瞭地說，掌權者和行使權力的物件全都是一群毫無知識的人，用卡爾·馬克思的話說，沉浸在鄉村生活的極端愚蠢的活動中。這種局面非常有可能存在，非常實在，在人類以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並不少見，甚至在我們這個時代裏，也不是完全不為人所知的。」(頁119)「如果把這種「文化統一性和文化雙重性」的對立強加在我們確定的四種形式之上，立即會出現八種可能的情况(頁124表2，此略)。」「模式表現的八種可能的情况中，有五種與民族主義無關，其中四種是因為沒有文化上的差異，兩種是因為是否接觸中央支持的高層次文化的問題沒有出現。於是，還剩下三種形式的民族主義。」(頁129)第一種是「第二行代表了所謂的哈布斯堡王朝傳統的民族主義」(頁128)；第二種是「第四行代表的情况很有意思：即有些人有權，有些有沒有權。這種差異與文化差異有關，必須從文化差異的角度來理解。但是，在受教育機會的問題上，群體之間不存在重大差異。這裏的情况是怎樣的呢？與這個模式相對應的歷史現實，是十九世紀的義大利和德國的國家統一型民族主義」(頁129—130)。「第三種形式最恰當的名稱是「散居國外者的民族主義」，作為一個歷史事實，它是民族主義的一種明確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和重要的次生形式。」(頁133)

關於民族主義的未來，他認為：「民族主義最動盪的階段，是伴隨著早期工業主義和工業主義擴展的那個階段。」(頁147)「隨著經濟發展，這個距離也會在絕對意義上繼續擴大。不過，一旦特權階層和非特權階層都達到某種水準之後，距離感就不再那麼強烈了。」(頁150)未來社會，「我們可以預期，民族主義衝突的尖銳程度將減弱。致使衝突尖銳化的，是早期工業主義帶來的社會差別，是工業主義發展的不均衡。那些社會差別可能並不比農業社會泰然容忍的差別更糟，但是，它們不再會因為長期存在，因為已經成為傳統，而被淡化或者被合法化，它們存在的環境，在其他方面給人以希望，鼓勵人們對平等的期望，要求流動性。凡是文化差別起著劃分這些差別的地方，就會出現麻煩；反之，就會天下太平。」(頁

158—159)「由於上述原因，可以期望晚期工業社會（如果人類有足夠的時間來享受它的話）成為一個民族主義僅以一種淡化的、毒害程度較輕的形式存在其中的社會。」（頁160）

二 對蓋爾納早期民族主義的分析

首先從他對未來社會民族主義的發展趨勢與目前現實發展的矛盾來看，他預測就錯了，民族主義在當今世界不是淡化了，而是越演越烈，他的預測與現實不一致，原因何在？在於他預測推論的基礎。「我們的論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對全球經濟增長因而也對革新和職業變化作出的持續承諾的意義的影響。我們的論點還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堅持建立在對富足的承諾和普遍的丹麥金基礎之上的社會。」（頁149）經濟持續增長、財富不斷增多、社會的流動性使社會差距越來越小，「如果國家間可以自由往來成為普遍現象，民族主義就不再是一個問題；或者，文化差異引起的溝通上的差距不再有意義，不再會引起民族主義的緊張情緒」（頁155）。他引用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書的觀點說：「雖然沒有理由假設所有可能的技術革新終將枯竭，但是，的確有理由認為，一旦超出某一點，新的技術革新可能不會再對社會結構和整個社會產生任何重大的影響，其根據來自這樣的推論，即一個人的財富超過某個點之後，再增加的財富不再能夠改變他的生活方式。」（頁149）

經濟的發展會出現這種狀況嗎？不會。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的報告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業化的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方面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這個行星上增長的極限有朝一日將在今後一百年中發生，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力雙方有相當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²鄧尼斯·米都斯的報告是60年代發布的，報告中預測人類經濟增長的極限就是本世紀的上半期。「所以，我們可能正處於一個困惑之中——一個可能沒有滿意答案的問題，對於那些已經達到了的人，限制消費的生活方式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道義上是毋庸置疑的、或者生態上是不充足的。向所有的人推廣這種生活方式，只會加速這個生物圈的毀滅。全球環境不可能支持我們當中的11億像美國消費者那樣生活，更何況是55億人或以後至少可達到80億的人口？」³「新技術是一個經濟上的勝利——但它也是一個生態學上的失敗。」⁴「可以被看作是影響著環境污染急劇化的三個因素：人口多少、富裕程度、以及生產技術的污染傾向和規模——它們的相互影響是甚麼？一個相當簡單的數字關係把排入到環境中的污染物數量與這三個因素聯結在一起了，被排出的污染物等同於這三個因素的乘積：人口乘以人均現有的經濟利益的數量，再乘以這種經濟利益所產生的單位污染量。」⁵「危機既不是一個自然的驟然而來的結果，也不是人類的生物學活動的力量用錯了方向。地球之所以被污染，既不是因為人是某種特別骯髒的動物，也不是因為我們的人口太多了。錯誤在於人類社會——在於社會用來贏得、分配和使用那種由人類勞動從這個星球上的各種資源中所攝取來的財富的方式。」⁶「簡言之，我們可以通過下列的順序來追溯環境危機的根源。環境的惡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工業和農業生產技術的介入引起的，這些技術是一個邏輯上的錯誤，因為它們是被用於解決單一的彼此隔離的問題，沒有考慮到那些必然的『副作用』。這種副作用的出現，是因為在自然中，沒有一個部分是孤立於整體的生態網路之外的。反之，技術上的支離分散的設計是它的科學根據的反映。因為科學分為學科，這些學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樣一種概念所支配著，即認為複雜的系統只在它們首先被分解成其彼此分割的各個部分時才能被瞭解。還原論者的偏見也趨於阻礙基礎科學去考慮實際生活中的問題，諸如環境惡化之類的問題。」⁷

既然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永遠不可能滿足全球人口的需求；不管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多麼標榜它的自由、平等、「流動性」和「溝通」，社會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不僅包括資本主義國內由於一般利潤率不斷下降規律所造成的影響，而且包括全球範圍內、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經濟、維護其在全球的戰略、能源等方面的安全和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從眼前來看提高了經濟發展水準，但由於不能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在世界科技發展中處於劣勢，在與發達國家爭奪世界的資源環境使用和控制權等方面不可能取得優先地位，而本國的資源環境通過世界市場以商品的形式流向世界、被消耗；從長遠來看，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災難，是發展中國家西方化、再被殖民化的過程。所以，民族主義的存在的基礎就仍然存在，它不僅「是伴隨著早期工業主義和工業主義擴展的那個階段。」並且進一步激化，目前國際上的伊拉克問題、車臣問題、阿富汗問題、中東和平進程等無不是激化的表現。

其次，我們來看看蓋爾納認為的產生民族主義的因素和原因。他認為導致民族主義的根源是社會分工，由於分工和「不同的人群在先天能力方面多少存在一些差異。以為所有的才能都是絕對平等分布的假設，就像一塊土地完全是平的說法一樣是不可能的。同樣明顯的是，在才能分布問題上，社會因素遠比天賦更重要」（頁90），「這種勞動分工要求參與者在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之間，甚至在自己的一生裏，時刻準備從一種職業轉換到另一種職業。他們需要共同的文化，一種識字的、世故的高層次文化。它要求他們能夠不受背景的限制，與所有的人在面對面的短暫接觸當中用抽象的交流方式進行密切交流。人們出於對財富和增長的渴望而強加在工業秩序之上的所有這些基於專業他提高的要求，如流動性、溝通、規模等等，使其社會單位必須具備龐大的規模，但是在文化上必須統一。要相維持這種統一（因為識字而）必然的高層次文化，需要國家的保護，需要一個集中的維持秩序的機構或者一些機構，由它來儲備和部署維持高層次文化、確保其在整個人口中傳播所需要的資源，這是前工業社會既不可思議又無法嘗試的成就。」（頁184—185）在前工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時候，就形成了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運動。

顯然，分工、教育、文化是導致民族主義的幾個因素，而且他認為導致民族主義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文化和權力，這兩者按照民族主義理論是缺一不可的潛在的合作夥伴」（頁15），每個高層次文化在追求自己的政治權力單位或國家，就像「每個姑娘都應該有丈夫，並且最好是她自己的丈夫」一樣，「我們的模式與馬克思主義模式的差別在於，根本沒有提及資本主義的控制或者所有權的問題。文化的認同，獲得權力的機會和受教育的機會，是作為前提被引入這個模式的唯一要素，被用來引導出我們提出的八種可能的情况。資本、所有制和財富被擱置在一旁，而且是有意這樣做的。這些曾經如此受人尊敬的因素被另一個因素所取代，這就是人們一般所說的受教育的機會，意思是說擁有或者能夠得到一整套技能，這些技能使人們能夠在工業勞動的分工的總形勢下有良好的表現。我認為這種觀點完全是合理的。這是自由資本主義學派中研究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們經常使用的觀點。當相當貧困的人口具備了應有的態度的時候，會有令人吃驚的良好表現；而為援助發展而湧入不合適的人類環境的資本則一無所獲。資本和資本主義一樣，似乎是一個被過高估計的範疇。」（頁127—128）這顯然是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為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服務的。他明確表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他說：「總的看，社會由物質決定的觀點似乎過時了。」（頁153）「一般地講，由可獲得的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似乎沒有多少道理。狩獵社會和農業社會不是完全一樣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說，尤其災難性的一點是，決定性的（國家和識字等）上層建築特徵，與真正關鍵的基礎結構的外在的變化表現，即食品生產的開始之間，沒有相互聯繫。」（頁52）

最後，我們來看看它對民族主義本質的認識。民族主義本質是甚麼，體現在他對民族主義下的兩個定義上，第一個定義是「簡言之，民族主義是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在要求族裔（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個國家中，族裔的疆界不應該將掌權者與其他人分割開。」第二個定義是「民族主義的定義，是為使文化和政體一致，努力讓文化擁有自己的政治屋頂。」民族主義包括民族主義情緒、民族主義運動（頁1）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頁161）。他只看到民族矛盾激化時民族主義意識和民族主義情緒要求政治權力的激烈的鬥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這種外部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時，就看不到民族主義了。其實一個民族在長期的形成過程中，一直依靠強大的民族感情維繫著，這種民族主義感情就是蓋爾納不談論的「愛國主義」（頁180—181）。民族矛盾的激化是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沒有根本經濟利益衝突的民族糾紛不會導致激烈的民族主義運動，所以說，民族主義問題的本質是根本經濟利益衝突的一種表現形式。「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隨之消失。」⁸因此，蓋爾納所謂的民族主義也就不存在。「一個人必須有一個族籍（nationality），就像他必須長著一個鼻子、兩個耳朵一樣；這些細節當中的任何一個出現缺陷，都不是不可思議的，而且這種情況時有發生。……不過，這一切竟會顯得如此真實，這本身的確就是民族主義問題的一個方面或者是它的核心。」蓋爾納偏偏就忘掉了這個核心。

註釋

- 1 徐波、陳林：《民族主義研究學術譯叢》，代序言。
- 2 （美）鄧尼斯·米都斯等：《增長的極限》[M]，「英文版序言」。
- 3 艾倫·杜寧（Alan Durning）：《多少算夠——消費社會與地球的未來》[M]，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章「消費的困惑」。
- 4 （美）巴里·康芒納（Barry Commoner）：《封閉的循環——自然，人和技術》[M]，第九章「技術的缺陷」。
- 5 同註4，第九章「技術的缺陷」。
- 6 同註4，第十章「各種社會問題」。
- 7 同註4，第十章「各種社會問題」。
-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潘志新 貴州師範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